

主教以及所有圣俸领取者不得转让教区收益，出租教产不得超过二十一年或三代人。这项法律表面上保护教产，却准许王室例外，滥权因而盛行。本朝廷臣经常跟主教和圣俸领取者达成协议，假装将教产转让给女王，女王再转让给缔约人。^① 这种掠夺教产的做法一直延续到詹姆斯一世初期。教会乖命舛，饱受种种侵凌。俗人继续掠夺教产，直到教会一贫如洗，抢劫徒然招怨，得不偿失。

新教和天主教神学家在本届国会上严肃地争辩，掌玺大臣培根莅临辩论会。一如既往，王室教旨的辩护士大获全胜。天主教辩护士受到顽固倔强的判决，甚至面临牢狱之灾。^② 新教徒受到这次胜利的鼓舞，大胆地推进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步骤，向国会提交了废除弥撒的提案，^③ 恢复了爱德华国王的礼拜仪式。而且规定任何人偏离规定的祭拜模式，或是不参加教会与圣餐；都会受到惩罚。就这样，整个宗教制度在一届国会期间完全改变了，没有任何暴力、骚乱或喧闹。这一切都源于一位年轻女子的意志；她当时登基未久，许多人都认为她的王位资格容易面临严重的挑战。当时的人似乎因此事而大为惊诧；其实举国各地一开始获悉伊丽莎白继位时，就已经料到了这一天。

下议院还为女王作出了一项牺牲，难度高于批准任何宗教信条。他们投票通过一项补助金：对土地征收每镑四先令；对动产征收每镑两先令八便士；以及十五分之二税。国会在

① Strype, vol. i. p. 79.

② Ibid. p. 95.

③ 1 Eliz. cap. 2.

任何情况下，对女王始终毕恭毕敬、言听计从。他们甚至迫不及待地请求她：在国会闭幕前早择夫君。他们以为，就女王的性别和年龄而言，这个提议不应该不合她的心意。女王听取陈词，彬彬有礼，但不予接受。她对发言人说：国会的诉求通常只能视为一般性建议，并非自居有权指示女王择夫；寡人无意冒犯建议者，深知议绅完全出于忠爱之忱，绝无他意。鉴于他们身为臣民，朕身为女性君侯，不受任何约束，他们不宜多加干预。即使不佞身居草野、危机四伏，也会认为婚约主要是一种负担。何况当前朕意在于：社稷之重，在予一身。此身已非已有，理应为宗教的利益和臣民的幸福而奉献。英格兰即朕之夫君，以身相许，金石弗渝（此刻，她展示指上金戒；见证她自继位之日，即已许身王国）。英伦四海臣工，皆朕赤子。哺育万民、治国如家，朕之分也。有民岂曰无子？许国何谓徒劳？不穀纵有家室之念，亦当以臣民福利为先。朕苟以童贞之身终老；赖上帝之福佑、诸卿之辅弼、寡人之庙算，仍可望大位有归、国本无虞。新君临御，或将有逾于寡君；慈惠爱民，不令本朝专美于前。寡人渺渺之身，流芳后世、名垂竹帛，非敢望也。朕之衷心所欲，不外乎委身大化之日，墓石有铭：“伊丽莎白长眠于此；童贞女王以童贞终一生。”^①

国会闭幕后，^② 宗教相关法律付诸实施；几乎没有任何教会团体抵制。礼拜重新使用本国俗语；牧师恢复了宣誓效

① Camden, p. 375. Sir Simon d' Ewes.

② 值得注意的是，卡姆登认为：本朝首开国会，竟没有剥夺任何一人的公权；而是恰恰相反，国会恢复了一些人的公权。女王陛下政府的宽厚，至少是审慎，昭然若揭；相形之下，前朝的严苛显而易见。

忠君主至高权力的义务。由于前一段时间疾疫流行，主教的人数已经减少到十四人。除了兰德费主教愿意服从之外，其他主教全体抗命，因此教区遭到剥夺。不过，英格兰全境有近一万个教区；愿意为宗教信念牺牲生计的低级神职人员只有八十名教区牧师和代理牧师、五十名受俸牧师、十五名学院院长、十二名会吏长和许多教务长。^① 高级神职人员身在众目睽睽之下，为了维护荣誉，必须坚守不渝。不过大略而言，新教徒在玛丽以前推行的变革中更为严格、更多遵循自己的良心。天主教徒更多依赖感官、遵循共同的日常仪式；改革派主要着眼于精神、更接近形而上学体系，前者能更迅速地掌握心灵。不过，自宗教改革开始以来，新教徒一方蒸蒸日上，与其虔诚和博学成正比。天主教徒仍然愚昧而怠惰，奉行古老的信仰，或者不如说奉行古老的习惯做法。但改革派必须在方方面面发动论战，依靠标新立异和骚扰纠缠来唤起热忱。他们衷心为教义献身，准备为抽象的思辨理念而牺牲自己的财产和生命。

英国宗教仪式仍然保存了原有的形式和典仪，有许多地方类似于古老宗教，因此更趋向于跟天主教和解，保留国教。女王禁止在宗教模式上自立门户，同时新仪式在每一个方面都排除了有悖于天主教的仪式。^② 因此，即使是身为罗马天主教的忠诚信徒都可以毫不踟蹰地参加国教仪式。如果伊丽莎白只顾自己的宗教倾向，国民信仰的外表仍然会介于新旧两教之间。她热爱邦国及其荣耀，一切举措无不因此影响；由

① Camden, p. 376. Heylin, p. 115. Strype, vol. i. p. 73, 有许多细微的异文。

② Heylin, p. 111.

此，天主教的浮华盛对她的吸引力。她仅仅是因为迁就自己一党的偏见，才放弃了圣像、向圣徒陈词和为死者祈祷的做法。^① 某些外国君主出面斡旋，希望为罗马天主教徒争取在若干市镇建立独立教会的特权，但女王不予批准。她声称：宽容异教，显然有扰乱邦国和平的危险。^②

女王和国会一面着手解决国教问题，一面继续议和。和会首先在塞坎姆举行，后来移至康布雷城堡；法兰西、西班牙和英格兰大臣在会议上协商。伊丽莎白处理对外交涉事务，显得同样审慎，却没有获得同样的成功。菲利普竭尽全力，谋求归还加莱。一方面，他在道义上有责任弥补英格兰的损失，因为后者卷入战争，完全是因为他的缘故；另一方面，法兰西在低地边境虎视眈眈，他的利益攸关，务求除此肘腋之患。只要他仍然怀有向女王求婚的打算，就不会同法兰西的亨利达成和议。甚至在英格兰改革宗教，使得这种希望完全断绝以后，他的大臣仍然讽示女王：西班牙的求婚既合情合理，又光荣体面。如果她保证在六年内维系英西联盟，继续反对法兰西的亨利，虽然西班牙与法兰西的和平条款已经一一拟定，他仍然愿意继续作战，直到女王获得满意的和平条件。^③ 但伊丽莎白咨询大臣后，明智地拒绝了菲利普的提议。她明白：王国财政岌岌可危，父王、王兄、王姐负债累累；内政处处紊乱，国民各立朋党，易动难安。她断定：王国至少需要若干年的和平，才能恢复繁荣；只有到那时，她

① Burnet, vol. ii. p. 376, 397. Camden, p. 371.

② Camden, p. 378. Strype, vol. i. p. 150, 370.

③ Forbes's Full View, vol. i. p. 59.

才能扬威异域、定霸万邦。她非常清楚：法兰西的亨利视加莱为命脉，当前不可能通过条约收复。因此，她宁愿丧失加莱，也不愿意依附西班牙。因此，她命令英国使臣艾芬汉姆勋爵、伊利主教、沃顿博士结束谈判，且根据任何合理条件与法王亨利缔结和约。亨利提议：将法兰西王太子的长女许配给伊丽莎白的长子，以归还加莱为公主的嫁妆。^① 但女王明白：举世皆知，这样的条款易于规避。因此她坚持更公正，至少是表面上更合理的谈判条件。最后，双方议定：亨利应该在八年内归还加莱。如果他未能如期归还，就应该赔偿女王五十万克朗（crown），加莱名义上仍然属于女王。亨利应该找到七八个外国商人（不能是法国商人），为这笔钱作保而且交出五名人质，保证条约执行。如果伊丽莎白在此期间对法兰西或苏格兰开衅，就要丧失她对加莱的所有权利；但亨利如果向伊丽莎白开战，就应该立刻交还加莱城堡。^② 对此，任何有洞察力的人都能看出：这些条款不过是放弃加莱的粉饰，但他们原谅女王，因为她有不得已的苦衷。他们甚至颂扬女王的审慎，因为她不作无谓的斗争，就屈服于不可避免的结局。英格兰一旦对法兰西议和，对苏格兰议和就是顺理成章的后果。

菲利普和法王亨利相互归还他们在战争中占领的所有对方领地。菲利普迎娶法兰西长公主伊丽莎白；公主原先许配给菲利普的儿子唐·卡洛斯。萨伏伊公爵迎娶法王亨利的妹妹玛格丽特，且收回他在萨伏伊和皮埃蒙特的领地，除了法

① Forbes, vol. i. p. 54.

② Forbes, p. 68. Rymer, tom. xv. p. 505.

兰西保留的几座市镇以外。就这样，欧洲和平大体上得以恢复。亨利八世有两次婚姻：一次娶阿拉贡的凯瑟琳，另一次娶安妮·博林。两次婚姻似乎互不相容，不可能同时合法和有效。但伊丽莎白的出身跟姐姐玛丽相比，颇为不利。亨利八世的第一次婚姻获得了当时英格兰所有世俗和宗教权力的认可。自然，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双方都真诚地相信：他们这次婚姻的后裔完全合法。但亨利八世的离婚和第二次婚姻就受到罗马天主教会的直接反对。虽然英国国会和教务会议都批准了亨利八世与安妮·博林的婚姻，但有些人坚决矢忠于罗马天主教会；有些人严于教规，他们因此认为国王这次婚姻完全不合法，同时一并否认女王的继承权。王位的下一个继承人是苏格兰女王玛丽，她现在已经嫁给法兰西王太子。苏格兰女王实力雄厚，加以继承资格表面上可靠，使她成为伊丽莎白的劲敌。法兰西国王秘密游说罗马，希望教皇颁布法旨将女王逐出教门。她依靠菲利普为她的利益斡旋，成功地挫败了法王亨利的图谋。菲利普这样做，主要出于利益，而非友谊或慷慨。但法兰西宫廷并没有因这次挫败而灰心。吉斯公爵和他兄弟认为，如果外甥女继承苏格兰王位后，又继承英格兰王位，就能大大增加他们对法兰西王室的影响力，使国王无法忽视他们的要求。法王在吉斯家族的劝诱下，命令王太子夫妇公开袭用英格兰国王和女王的头衔和纹章。他们把英格兰王室纹章绣在所有的车马、家具、侍从号服上。英国大使抗议这种僭越，对方避而不答。苏格兰女王是英格兰王室后裔，因此，她根据许多君侯的先例，有权袭用英格兰王国的纹章。不过，这种做法一向需要事先许可，袭用的

纹章应该跟原始的纹章有明显的区别才行。苏格兰女王却从来没有遵守这些规范。何况，伊丽莎白对此一目了然：这种觊觎在王姊玛丽一朝没有开展。因此，法王的意图是：不失时机地质疑她的出身和王位的合法性。伊丽莎白慑于这种危险，从此刻骨猜忌苏格兰女王。她下定决心，一定不能让法王亨利的谋划得逞。法王为了庆祝御妹与萨伏伊公爵订婚，在巴黎举办了一次比武赛会，在竞技中意外身亡。伊丽莎白并不因此而改变看法。她获悉：法兰西新君弗朗西斯二世仍然毫无保留地袭用英格兰国王的头衔，决定将法王和王后（苏格兰女王）视为不共戴天之仇。当时苏格兰的形势为她提供了有利的机会，既能报复她受到的伤害，又能保障自己的安全。^①

圣安德鲁斯红衣大主教遇害，苏格兰天主教会因此失去了首脑人物。大主教严厉、勇敢、干练，使他成为苏格兰改革派的最可怕的劲敌。从此以后，制裁异端的法律渐渐疏于执行。摄政太后任用审慎、温和的大臣，来治理这个国家。她无意为教士的偏执或教会的利益而牺牲邦国的世俗利益。她认为，更合适的方法是顺应潮流，对于她已完全无力压制的教义，不如默许其发展。她获悉爱德华去世、玛丽继位，希望苏格兰改革派丧失了英格兰王国的强援，就会失去争取未来成功的热忱，渐渐回归祖先的信仰。然而，世俗政治的准则极少能适用于宗教的发展和变革。事态的发展使摄政太后大失所望。许多英格兰传道士慑于玛丽政府的严厉，亡命

① Keith, p. 66. Knox, p. 101.

苏格兰。在这里，他们获得更多保护，政府显得更温和。于是，他们一面传播新教教义，一面大肆宣传偏执天主教徒的残暴，在苏格兰全国引发了正当的恐怖氛围。他们向苏格兰人显示：如果他们的敌人获得无法节制的权力，改革派的信徒将会落得什么下场。如果教会组织获取权力与财富的手段温和节制，那么它越是以宽厚和慷慨来软化改革者的热忱，就越能安全地保有合法当局授予的种种利益。但罗马教会源于迷信、手段过火，无论从公共利益还是私人利益出发，都有许多理由支持改革派。做法过分的教会长期依靠这些暴行权术来维持统治，但时移世易，苛政仅仅激怒了新教派，促使他们冲破理性与节制的一切边界。苏格兰显然日益接近这个转折点。如果只考虑由此产生的后果，任何人都会倾向于同等责备两党；如果扩大视野，任何人都会注意到人类事务必不可少的进步，人性固有的法则在发挥作用。

苏格兰改革派的首脑人物有：阿盖尔伯爵和他的儿子洛恩伯爵、默顿伯爵、格兰凯恩、丹恩的厄斯金和其他一些人。他们明白危险近在咫尺，希望传播新教教义，秘密结社盟誓。他们自称“上帝的盟会”，称官方教会为“撒旦的教会”，以便划清界限。他们结社的宗旨如下：我们察觉到：撒旦及其门徒、当代敌视基督的教派恣意肆虐，企图颠覆和毁灭基督的福音和教会。我们责无旁贷，必须为吾主基督的事业奋斗、保证其胜利；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因此我们向全能上帝及其教会承诺：运用我们的一切力量、资源乃至生命，维护、促进、落实上帝及其教会的真言；在任何情况下皆誓言为基督福音与教民圣礼的不二忠仆。我们要维护、供奉、

保卫基督福音和教民圣礼。由此，吾辈全体会众不遗余力、不惮危难，反对撒旦及一切邪恶势力。这些邪恶势力企图残害、扰乱上述会众。我们矢忠圣言，结为圣会；弃绝撒旦的教会及其所有可憎的迷信和偶像崇拜；公开宣布跟他们势不两立。我们在上帝面前信誓旦旦；签署本文，见证结社。爱丁堡。1557年12月3日。

可惜，这份虔诚盟约的签署者并不满足于仅仅为新教派争取宽容。无论如何，他们的主张跟罗马教会水火难容，他们抵制支持官方教会、危害世俗社会的残暴法律，值得赞赏。不过很显然的一点是，他们走得更远，他们激发出的精神立刻体现在行动上。他们在属于自己的权威支持下，作出决议：“上帝的盟会”用俗语祈祷，王国所有教区的教堂都应当效法；^① 布道应该在私人住宅举行，使用《圣经》译本；直到上帝感化君心，允许真正的信徒和忠仆公开布道。^② 这种盟约始终是叛乱的前兆，激烈攻击官方教会实际上就是叛乱的开端。

盟约公开宣布前，教士对改革的进展感到恐慌。他们企图雷厉风行，恢复失去的权力，结果进一步增加了敌人的数量和热忱。汉密尔顿大主教逮捕了沃尔特·密尔牧师。密尔皈依新教，毕生行迹无懈可击。审判在圣安德鲁斯举行，以异端罪判处密尔火刑。公众普遍厌恶这种野蛮的暴行。主教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法说服任何人担任世俗法官，进而向密尔宣读判决。甚至行刑日期确定后，圣安德鲁斯所有商店

① 当时苏格兰改革派使用爱德华国王的祷文。Forbes, p. 155.

② Keith, p. 66. Knox, p. 101.

都闭门停业。没有人愿意出售将他捆在刑台上的绳子，大主教只得亲自装备刑具。在这一情况下，受刑人通常都会表现出不可思议的勇气，使观众大为惊诧。国民为了表示他们厌恶教士的残酷，在刑场竖起了石碑。教士刚刚下令移除石碑，热忱的民众就自发地重新竖起。^① 宗教和政治力量都有赞许酷刑的动机，因此反对者的行为徒劳无益。这是天主教会最后一次在苏格兰滥施暴虐。

过了一段时间，国民公然表达自己的感情倾向；教士足以由此预见到自己将要面临的下场。圣吉尔斯是爱丁堡的主保圣人，在他的节日中，人们会抬着他的圣像举行宗教游行。新教徒为了阻止这个仪式，在节日前夜偷走了教堂中的圣像。他们觉得这样做会给那些教士一个措手不及，可以心满意足。然而，教士仓促间又制作了一个新圣像。民众称之为小吉尔斯，并大肆嘲笑。他们抬着新圣像上街，市镇和附近地区的教士都参加游行。当时只要摄政太后在场观看，群众就能避免暴力。她一走，民众就扑向这个偶像，把它扔进泥坑、打成碎片。教士和修道士们惊慌失措、四散奔逃，对他们崇拜的偶像见死不救，因此受到普遍的戏侮和嘲笑。

“上帝的盟会”受到这些表现的鼓励，公开游说人们入盟。这时，英格兰的玛丽去世，伊丽莎白继位；他们追求最后成功的希望大增。他们大胆地向摄政太后请愿，要求改革教会，清算教会长老和神职人员邪恶、可耻、可憎的生活。^② 他们撰写请愿书，准备提交给国会。请愿书中声称：他们业

① Knox, p. 122.

② Knox, p. 121.

已盟誓，跟可憎的偶像崇拜一刀两断，不再宽容天主教会的滥权行径。他们要求：惩罚异端的法律应该由世俗法官单独行使；《圣经》应该成为鉴定异端的唯一尺度。^① 他们甚至向教务会议请愿，坚持祈祷时应该使用俗语；主教人选须经教区绅士同意、牧师人选须经教区居民同意等主张。^② 摄政太后审慎地调停各派。她为了让女婿法兰西王太子通过婚姻登上王位，同时考虑到其他因素，不愿意采取极端措施，得罪任何一方。

但她获得这个让步后，接到了法兰西国王的命令，要求她严厉镇压改革派、以雷霆手段恢复王室权威。^③ 这个横暴的命令可能来自她的兄弟们。她传唤新教传道士的贤者前往斯特林，接受枢密院质询；但这些人的追随者为了支持和保护他们，向斯特林进军，声势浩大。摄政太后担心发生暴动。据说，她承诺决不伤害这些传道士，最终换取群众自行解散。^④ 然而，枢密院因为这些传道士没有出席，判决他们全体为逆贼。这一举措激怒了民众，他们因此决定再次拿起武器，反对摄政的权威；进而将反对官方教会的斗争推向极端。

在这个关键时刻，约翰·诺克斯从日内瓦回国。他在那

① Ibid. p. 123.

② Keith, p. 78, 81, 82.

③ Melvil's Memoirs, p. 24. Jeb, vol. ii. p. 446.

④ Knox, p. 127. 我们必须加以提示：后来有理由怀疑，太后可能从来没有提供过明确的承诺。当时党派林立，很容易产生诽谤；尤其是醉心于宗教的人会觉得为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上帝的盟会”在他们的宣言中历数摄政太后的种种弊政，却未曾谴责她这一次背信弃义。因此这个承诺可能不过是道路流言而已。天主教派常常坚持，对异端无须遵守信义。他们的对手似乎也认为，对偶像崇拜者无须实事求是。

里亡命数年，与约翰·加尔文交往，最大限度地吸收了新教派的狂热，给自己狂暴的天性火上浇油。改革派的首脑邀请他返回苏格兰，在柏斯开坛讲道。此时民情汹涌，他照样慷慨陈词，怒斥罗马教会的偶像崇拜和其他种种弊端，极力煽惑听众犯上作乱的热忱。这次布道后，一位教士胆大妄为地公开了他的圣像和圣骸收藏，准备亲自举行弥撒。狂热的听众和漠不关心的旁观者都怒不可遏。他们愤怒地攻击教士，打碎圣像，撕毁图像，推倒祭坛，把圣骸扔得到处都是，正如他们自己所说，要将偶像崇拜的器物扫地并尽、片甲不留。从此，他们人数日增、斗志更盛，立刻将灰衣和黑衣修道院掠劫一空。加尔都西修道院遭遇了同样的命运。民众不以抢劫和驱逐修道士为满足，而且恨鸟及屋，片刻间化广厦为残垣。法夫郡库柏的居民不久就如法炮制。^①

这些暴乱激怒了摄政太后。她召集军队，准备严惩叛乱。她麾下大约有两千名法国军队，苏格兰军队却寥寥无几，还有一批拥戴她的贵族。她在柏斯十英里内扎营。甚至阿盖尔伯爵和女王私生兄弟、圣安德鲁斯长老詹姆斯·斯图亚特勋爵虽然深切同情改革派，这一次仍然扈从摄政太后。他们或许是不满民众的暴行，或许是想运用自己的威望和影响在两派之间斡旋。另一方面，盟会准备自卫。格兰凯恩伯爵从西部率军增援他们，许多贵族和绅士支持他们。他们人数众多、士气高涨，声势可畏。盟会干脆讽示摄政太后：如果天主教会的凶徒把他们逼得走投无路，他们有办法寻找外援。他们

① Spotswood, p. 121. Knox, p. 127.

是太后的臣民，同时也是耶稣基督信徒盟会的成员，因此臣民尽忠君上的义务不能违背尽忠上帝的义务。^① 他们向太后的扈从贵族申诉：他们过去的暴行是为了维护上帝之道，上帝的神圣诫命要求消灭偶像崇拜及其所有遗迹。虽然所有世俗权威都是神圣的，但权威和行使权威的人差别甚大。^② 应该考虑到：无论该死的罗马天主教徒所说的暴行是真是假，他们是在用火与剑保卫耶稣基督的真正宗教。他们告诫那些加入王师的旧日盟友：“他们已经被视为上帝的叛徒，同时已经被逐出盟会，不得再参与上帝以其大德大能在信徒当中建立的圣礼。他们的圣事跟基督在福音书中口授的真言有同样的权威，真言说：‘如果你想要赦罪，就会得到赦罪；如果你想要保留罪恶，就会保留罪恶。’”^③ 我们由此可见：这些新圣徒高傲自负，不亚于古老教会。难怪乎他们会跟后者反目成仇，争夺统治权。他们给官方教会致辞，附在所有这些宣言后面，标题是：“耶稣基督在苏格兰的盟会致敌对基督在苏格兰的党羽、罪该万死的教会长老及其秃驴们。”^④ 致辞的要义与这个标题不相上下。他们对教士说：“你们施行暴政，不仅想毁灭我们的肉体，还想让我们的灵魂受恶魔奴役、屈从于偶像崇拜。因此，我们运用上帝赐予的全部力量和权力，对你们施行公正的报复和惩罚。是的，上帝命令以色列人灭绝迦南人；我们就要开始同样的战争。只要你们不肯放弃偶像崇拜，就永远不可能议和。我们信仰永恒上帝和上帝之子

① Knox, p. 129.

② Knox, p. 131.

③ Ibid. p. 133.

④ 这是对教士的侮辱性称谓。

耶稣基督，向福音书祈祷，正确行使圣餐礼。我们以他们的圣名为见证，将我们的意图告知你们。只要有上帝的帮助，我们就能抵抗你们的偶像崇拜。你们接受这个警告吧，不要欺骗自己。”^①

摄政太后发现叛军的热忱如此顽强，便接受阿盖尔和圣安德鲁斯长老的劝说，跟他们和解。柏斯开城投降，条件是：太后承诺既往不咎，不留法军戍守。立刻有人抱怨协定遭到破坏，但没有丝毫依据。他们伪称：有些居民由于最近的暴行受到骚扰；某些公认领取法国饷银的苏格兰军团在城里扎营。这些措施虽然表面上自有道理，却受到盟会大声疾呼的反对。^② 据称，摄政太后为了使这些举措正当化，宣称君侯不受承诺的严格约束，对异端分子无所谓信义。太后处在她的位置，完全可以找借口剥夺他们所有人的生命与财产；^③ 但这不符合她一贯的审慎和正直。相反，似乎所有这些暴行都不合她的意愿，她这时受到法国大臣的支配，她经常认为：如果所有事务完全由她处理，那么调和所有分歧并非难事，

① Keith, p. 85, 86, 87. Knox, p. 134.

② Knox, p. 139.

③ Spotswood, p. 146. Melvil, p. 29. Knox, p. 225, 228. Lesley, lib. x. 从盟会的宣言来看，柏斯协定其实没有像他们宣传的那样遭到破坏，参见 Knox, p. 184。苏格兰军团大概领取的是苏格兰饷银，因为盟会抱怨说：为了养兵，国家苦于征敛。参见 Knox, p. 164, 165。即使他们确实领取法兰西饷银，也并不违背协定；因为他们是本国军队，而不是法军。诺克斯从来没有说过：柏斯居民因为过去的冒犯而受到审判或惩罚，只说：他们苦于驻军的压迫。参见 p. 139。盟会的宣言只是说：许多居民出于恐惧而逃走。我们稍稍调查违背柏斯协定的谣言，就会发现：它非常像那个捏造的“不审判传道士”承诺。事情发生在太后与丹恩领主之间。领主聪明正直，可能愿意做一般性见证。如果太后被盟会的势力吓倒，承诺的目的是以后能够审判他们；那她怎么可能有力量执行这种骗来的判决呢？这样能达到什么目的？

无须动武。^①

盟会受到自己宗教热忱的鼓舞，由于这些失败而愤怒，没有安静多久。他们还没有离开柏斯，就不再以条约破坏为借口。他们签署了一份新盟约，除了承诺共同防卫以外，还以上帝的名义庄严宣誓：竭尽全力，毁灭一切有辱圣名的事情。阿盖尔和圣安德鲁斯长老也在其他签署者之列。^② 这两位首脑为了寻找背弃摄政、公开投奔盟友的借口，只得抱怨太后违背协定；这种说辞极其可疑，甚至纯属捏造。盟会受到生力军的鼓励，也完全接受了诺克斯火热的煽动，在克雷尔、安斯特拉瑟和法夫郡等其他地区重新集结起来，效法柏斯和库柏的先例，恣意蹂躏教堂和修道院。摄政太后率军镇压，发现对方实力大增，乐于休战几天，率军转进洛辛郡。改革派围攻柏斯，占领该城；由此进军斯特林，照例肆虐一番。他们所向披靡接着便向爱丁堡进军。不出他们所料：爱丁堡市民倾向于支持盟会，敌视教会和修道院，欣然打开城门。摄政太后率领为数不多的余部，退守邓巴，在那里深沟高垒，等待法兰西援军。

在此期间，她任用的党羽向人民指出这次公开叛乱的危险性。她试图说服民众：詹姆斯勋爵假装热心宗教，其实是狼子野心，意在窥伺神器。许多人有鉴于此，抛弃了盟会的军队，但更多人则由于军饷军资匮乏而离开。摄政太后发现叛军已经大大削弱，便冒险向爱丁堡进军，打算镇压他们。沙泰勒洛公爵始终追随太后，在他的斡旋下，太后同意议和：

① Ibid. Spotswood, p. 123.

② Keith, p. 89. Knox, p. 138.

她保证新教徒享有宗教宽容，他们承诺不再继续破坏教堂。不久，新教徒从爱丁堡撤出。他们离开前，公布了和约条款；但他们注意只公布对自己有利的条款，而且用欺诈的手段增加了一款：偶像已经摧毁的地方，不得重新树立。^①

人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达成的协议不可能长久。双方都尽可能地加强自己的力量，为随后的决裂作准备，决裂似乎不可避免。摄政太后已经从法兰西获得了一千援军，着手加固里斯城堡。盟会引诱沙泰勒洛公爵加入他们一方。公爵有倾向于他们的表现，为时已久；他的儿子艾伦伯爵从法兰西返回，促使他作出了最后的决定。艾伦伯爵在法兰西苦于亨利国王和吉斯公爵的偏执和猜忌，几经危难，幸而逃脱。不久，拉布洛斯率领更多的法军登陆。亚眠主教和索邦神学院的三位神学家接踵而来。他们准备了充足的三段论、学术权威、引文论据和学究气的争论，打算用来应对苏格兰传道士。他们所料不差：由于法兰西军队和火炮的来临，苏格兰传道士获得口实，力量大增。^②

蒙莫朗西卫戍长一直反对法兰西王太子和苏格兰女王联姻，他预见到：法兰西和苏格兰建立如此紧密的关系，会破坏两国的古老联盟。苏格兰人猜忌外邦的枷锁，很快就会将法兰西这个同心同德、利益攸关的盟友变成最根深蒂固的死敌。迄今为止，老臣的审慎还能避免这种后果，但法兰西的

① Knox, p. 153, 154, 155. 这位作者伪称这项条款是双方的口头约定，但是太后的抄写员在签署条约时遗漏了。这种说辞不大可信，或者说荒谬绝伦。而且，盟会在随后的宣言中，自己也不允许执行条约中没有的条款。Knox, p. 184. 何况摄政太后在签署条约时，难道会称自己的宗教为偶像崇拜吗？

② Spotswood, p. 134. Thuan, lib. xxiv. c. 10.

政务已经落入激进的枢密手中。他们很可能乐见苏格兰叛乱四起，从而提供发兵戡乱的口实，借此彻底征服这个国家。^①由此，他们可以做好入侵英格兰、立玛丽为英格兰国王的铺垫。盟会首脑非常清楚这种前景，明白自己面临的危险，知道只有大刀阔斧、一举成功，才能保证安全。这时，法王亨利二世突然去世，盟会首脑大受鼓励。他们运用自己的权威，通过了一项法案：剥夺太后的摄政权，命令法军撤出王国。盟会集结军队，将针对他们的法令付诸实施。盟会再度控制了爱丁堡，但无力久据该城。盟会军仓促征集，形同乌合，没有军饷，只要遭遇最小的挫败，甚至仅仅是胜利延迟片刻，就会四散奔逃。他们根本不是法兰西百战精兵的对手。某些苏格兰贵族，包括著名的博斯威尔伯爵，也站在法军一边。盟会首脑获悉：摄政太后的兄弟埃尔伯夫侯爵在德国征集了一支军队，准备讨伐他们。他们自度危在旦夕，于是乞师英格兰，情有可原。这时，宗教亲和力和国民自由的考虑抵消了两王国的宿怨。偏好和利益同样促成了这项举措。^②因此，盟会秘密派遣里丁顿、梅特兰和罗伯特·梅尔维尔，向伊丽莎白乞师。

伊丽莎白睿智的枢密阁臣许久才同意赴援。援助苏格兰新教徒，符合他们女主人的观点和利益。塞西尔尤其向女王

① Forbes, vol. i. p. 139. Thuan, lib. xxiv. c. 13.

② 苏格兰贵族在他们的宣言中说：“我们向英格兰或其他君侯求援，以前有，现在仍然有不得不做的正当理由。我们为了称颂上帝的圣名，应该向全世界简要地说明，让那些诋毁我们所作所为的人不知所措。为此，我们不惮于承认：在反对恶魔、偶像崇拜及其门徒的事业中，我们首先而且仅仅谋求上帝的荣耀深入人心、罪恶受罚、美德延续。我们在力不从心的地方都谋求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意愿无论如何都会实现。”Knox, p. 176.